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叶嘉莹 安易

王国维词

新释辑评

昨夜梦中多少恨
细马香车

两两行相近

对面似怜人瘦损

众中不惜褰帷问

陌上轻雷听渐隐

梦里难从

觉后哪堪讯

蜡泪窗前堆一寸

人间只有相思分。

中国书店

1111

新
釋
輯
評

[illegible]

100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王国维词

新释辑评

■ 叶嘉莹 安易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责任编辑：陶 玮 刘瑞玲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叶嘉莹 安 易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0 千字

印张：17.375

印数：0000—5000

书号：ISBN 7-80663-359-6/I·198

定价：33.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曾为溥仪的南书房侍从，又是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他曾以《殷周制度论》一文轰动于学术界，以“二重证据法”为新时期文史研究开启了科学的门径。他的《宋元戏曲考》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他的《人间词话》熔西方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为诗词评赏拟具了科学理论的雏形；他的《人间词》则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王国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才，还是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的先驱。他在各个方面的成果几乎都具有开创性，对20世纪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本书由叶嘉莹先生亲自参与、指导，与安易女士共同撰著。全书将王国维词按发表时间的次序排列，即：甲稿的61首、乙稿的43首、《观堂集林》之《长短句》中新增加的3首、《观堂外集》之《苕华词》中新增加的8首，共115首。另外，开列了王国维词各种版本附录于书后。还将66家作者的83种有关王国维词的文章或专著，以发表时间为先后次序，并列表附于书后，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上下）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罗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

他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侍从，又是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这位生活在社会转轨与文化转型之20世纪初的大学者，曾以一篇《殷周制度论》的史学论文轰动了当时的学界，曾以他的“二重证据法”为新时期文史研究开启了科学的门径。在文学方面，他的《宋元戏曲考》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他的《人间词话》熔西方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为诗词评赏拟具了科学理论的雏形；他的《人间词》则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见郭沫若《十批判书》），陈寅恪说他的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才，而且是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位先驱。他在各方面的成果几乎都具有开创性，对20世纪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只知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但实际上他和一般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人生和世事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自发的关怀。青年时代的王国维，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选择了哲学，并不是为了做一个以阐释别人的学说为事业的“哲学史家”，而是希望借助这西方的智慧来解决现实中人生的困惑。因此，后来当他对西方哲学研究有成却发现它们无助于解决现实的人生困惑，而他自己也不可能创建一个可以解决这些困惑

的哲学系统的时候，很快就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和史学。

但西方哲学所留给他的决不仅仅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那一个简单的哲学构架，而是一种对探索宇宙普遍规律及人生终极价值的兴趣与追求。这使他的胸襟眼界大大超越了当时尚热衷于争论是坚持国粹还是中体西用抑或全盘西化的一般学者，并以一种追寻“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语）的勇气去构建一座属于未来的中西文化接轨之桥梁。这座桥梁，也许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才有更多的人真正体会到了它的重要。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想像：在20世纪初那个社会剧烈动荡、人心无所适从的时代，抽象的哲学思维与儒家务实的传统在这位学者敏感的心灵中曾产生过多么激烈的冲突。我们也无法想像：这种与众不同的清醒甚至使他无法像许多传统文人常做的那样从老庄思想中借来一点点对人生的慰藉以维持内心的平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智与感情之间矛盾冲突的痛苦成就了他的《人间词》，使他能够在词体发展似乎已经尽善尽美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成功地写出了一种古人没有写过的新境界。

词这种体裁不同于诗。它本是晚唐五代文人士大夫在歌酒筵席上写给歌女去演唱的歌词。那些士大夫不幸生于末世，本已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志意可言；逢场作戏模仿歌女的口吻写歌女的相思来显示自己的才华，亦谈不上作者真正的情意之所在。但爱情这种题材是富有象喻能力的。当那些文人用美丽的语言、美丽的形象去描写美丽的女子对爱情的忠诚、期盼与幽怨的时候，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某些尚未彻底熄灭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失意的哀怨，以至某些难言的苦闷，或者是自己的人格修养，有时候就于无意中流露在写美女爱情的小词之中了。这种不经意的流露就使得这些歌词在美女爱情的表层形象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深隐幽微的、富含言外意蕴的美。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词之不同于诗的“境界”之美，它是晚唐五代直到北宋初文人小令之佳作中的美感特质之所在。但是词没有停留在“歌词之词”的阶段，到北宋开始

向抒情言志的诗的方向发展了。苏东坡突破了词在内容与风格方面的局限，开始用词这一体裁来直接抒写自己真实的情志，从而提高了词在文学中的地位，使它有了和诗一样的功能。因此，以苏、辛的词为代表的这一类直接抒情言志的词，可称之为“诗化之词”。然而苏词之所以好，却不仅仅因为他以诗为词，而在于他用世的志意与超旷的襟怀相结合之后在词中所呈现的超出于所言情志之外的一种人生境界之美。它既有开阔博大的一面，又有曲折深厚的一面。这种人生境界之美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它不但与苏轼本人的人品、情意及学识修养有关，而且与苏轼所处的时代及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辛弃疾的词也是一样，其好处不仅仅在于豪放，而更在于他收复中原国土的理想不能实现又不断受到猜忌打击，内心之中激愤与压抑冲突激荡而形成的一种“欲飞还敛”的姿态，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境界”之美。

“歌词之词”与“诗化之词”的境界之美都出于一种自然的感发而不是出于作者有意的安排。倘若你没有晚唐五代末世文人内心那种苦闷与挣扎的体验，没有北宋初晏、欧等人那种丰满的性格和深厚的学养，你所写的美女爱情的歌词就容易趋于浅俗和淫靡；倘若你没有苏、辛那样丰富的心灵和复杂的人生经历，你所写的诗化之词就有可能走向直白或叫嚣。那么怎样才能够使词这种神奇微妙的“境界”之美有一个可以攀跻的阶梯，使更多的作者能通过人工的努力来把握和创造这种美呢？于是在苏东坡之后，另一位北宋词人周邦彦就开创了以有心用意的思索安排来产生境界之美的“赋化之词”。也就是像写赋那样，通过立意构思、勾勒描写、象征寄托等人为的手段来丰富词的意蕴，从而使读者在词的表层美之外感受到一种深层的美。这类词在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姜夔、吴文英等许多名家和大量作品，所以词学家习惯把“赋化之词”称为“南宋词”。当然，也有的人不喜欢这类以“人巧”代替“天工”的作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赋化之词”虽然与晚唐五代及北宋的词有了较大的不同，但其中好的作品同样保持了词体所特有的那种富含言

外意蕴的“境界”之美。

词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演进过程。因此胡适有一个说法，认为从元代起词就死了，已经转世投胎化而为曲。至于清词，它所能做的只是对前人的模仿，可称为“词的鬼影时代”（见胡适《词选序》）。然而，胡适这样说是有其实用目的的，他是为了推广白话文学而把诗与词也纳入他的白话系统。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语言问题上，从而对词在美感特质方面的发展演变有所忽视。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所钦佩的学者王国维在词之境界上的新发展。

王国维其实是一个很自负的学者，在词的创作上也不例外。他对词之与诗不同的美学特质有深刻的体悟，对词体的发展演进有宏观的把握，因此他写词有明确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诗余”之消遣，不是对前人的一味模仿，而是要在前人似乎已经走尽的道路上再走出一条新路来。正如他在《静安文集续编》的自序中所说的：“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王国维欣赏的是五代北宋词，也就是词体演变之前期的“歌词之词”和“诗化之词”。这一类词中之佳者多为小令，其共同特点是能够使读者一读之下立即产生直接的感发。对南宋以后逐渐占领词坛主导地位的“赋化之词”，王国维是不甚欣赏的。这可能是因为他性喜自然不喜人工造作，而南宋词正好是以人工造作取胜的缘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人间词话》对南宋与北宋作者的评论中得到验证。可是，王国维还说，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这个“不及余之处”指的是什么呢？从《人间词》的创作来看，它与五代北宋词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有意”与“无意”的区别；第二是在词之境界上的发展。

在对词之美学特质的追求上，五代北宋词人是无意识的和不自

觉的，而南宋词人是有意识的和自觉的。王国维虽然不喜欢南宋词，但他追求词所特有的“境界”之美却同南宋词人一样也是有意和自觉的。理性的发展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但理性也常常对人类本性的自然与真实有所斫丧。清代词学家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这是对北宋词与南宋词很确切的评价。王国维以南宋词人写赋化长调的认真态度与求新创意写北宋风格的小令，有意地和自觉地在词中表现自己的情志甚至哲理，却能够取得五代北宋词那种自然和无意识流露的“浑涵之诣”的效果，这是他比北宋、南宋词人都高明的地方。就以《乙稿序》里提到过的他自己最满意的那一首《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来说：“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辜帷问”，写痴情如在目前，但这么真切的感情却只是一个梦，与梦中之真情慰藉相对照的是梦醒后的烛灭蜡凝和今生永恒的思念——“人间只有相思分”。这不是一首悼亡的作品，因为这首词发表的时候他的前妻还没有去世。那么，词中女子是他梦中的情人吗？是他心中的某种向往吗？可以说都有可能，但也可以说都不是。你只能感觉到词的深层可能隐含着许多作者不肯说、不想说或者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深意，但你却找不到一点点把柄可以坐实这些意思，最后只能承认这都是自己的读后联想而已。你不能不佩服他这首词在构思和立意上真是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这首词，应该说是兼具了“歌词之词”情景真切，“诗化之词”抒情言志和“赋化之词”创意巧妙的好处，在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上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当然，理性思考对自然与真实的干扰也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人间词》虽然以情景真切和自然不隔见长，但由于作者心中其实有很明确的创作意识，因此也常常有理性思考偏强、人工痕迹较重的时候。如《乙稿序》中同前边的《蝶恋花》一起提到的那首《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就是如此。这首词有比较明显的理性